虹影谈重庆文学：在网红标签与女性血脉之间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孟丽媛

虹影 编剧、导演。出生于重庆，代表作品有《饥饿的女儿》《好儿女花》等，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。在意大利获得奥斯卡文化奖的“罗马文学奖”，她自编自导的电影《月光武士》荣获2023年美国好莱坞下一代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剧本奖等9个荣誉。

“重庆是一个阴性词，是一位永远不会衰老的美丽女性。”虹影的言语间流淌着嘉陵江的水声，那些关于重庆的记忆，早已成为她文学世界的血脉。在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前夕，这位以《饥饿的女儿》《月光武士》等多部作品书写重庆的作家，向我们剖开了她与山城之间盘根错节的生命联结。

一座山城的女性魂灵

在虹影的文学版图里，重庆始终带着母性血脉的温度。“它特别女性，特别阴性。”她反复强调这个意象。与外界对“火暴脾气”的刻板印象不同，她笔下的重庆女人是多重奏：“特别吃苦耐劳，能包容一切苦难”——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底色。朝天门码头、南岸老街、横跨两江的桥，这些地标在《月光武士》《不死鸟》《好儿女花》中反复出现，而永恒的主角是江水，“它像重庆的血脉，承载着生命的沉浮”。

虹影的记忆里刻着两个重庆。童年江面浮沉的帆船与溺水者，曾是她心中最深的恐惧符号；而如今桥梁林立的现代都市，让她惊叹“堪比东京”。最震撼她的却是城市肌理的蜕变：“公共厕所漂亮至极！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样子。”她激动地举例，厕所从污秽不堪到洁净无味，成了丈量城市文明的隐秘标尺，“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”。

方言写作与使命突围

“我的小说里，重庆无处不在。”谈及故土，虹影的声音带着江水般的涌动。从朝天门码头的喧嚣、南岸老街的烟火，到解放碑的变迁、歌乐山的沉静，山城的骨骼肌理深深烙印在她的《月光武士》《饥饿的女儿》《不死鸟》等作品中。但最深刻的烙印是重庆方言——她多部作品坚持用方言写作，构建起一个地道的文学重庆。

“骂人的词，用普通话写就失去了魂魄。”虹影以《饥饿的女儿》为例解释道，“重庆的骂人话非常形象，甚至充满情色意味，却又不下流。这种语言的粗粝感、市井的生命力，只有方言才能传递。”在她看来，“方言有独特的质地和情感，普通话根本无法传递这种生命力。”

方言书写让码头工人的汗味、街巷妇女的泼辣、江风里的潮湿都能穿透纸背。虹影早期的写作如鲁迅般为底层女性发声的使命感，已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困境的勘探：“现在的我更关注人在命运中的挣扎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辛酸与失控。”当《饥饿的女儿》等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时，这些根植于重庆基因的方言表达，成为世界认识这座东方魔幻都市的文化密码。

网红浪潮下的文学困境

面对重庆的“8D魔幻”网红标签，虹影直言文旅热度与文学传播存在割裂：“游客因火锅和洪崖洞而来，但谁会因为读到书写重庆的小说而专程拜访？”她呼吁政府搭建双向赋能的平台：“我的小说改编电影后，常有外国读者想来重庆寻访故事场景——这才是文化真正的穿透力。”对于悬疑题材扎堆的现象，她强调核心永远是人而非景观：“我写《不死鸟》是源于对母亲记忆的追溯，魔幻地形只是命运的容器。”

给年轻作家的重庆密码

谈及新生代创作者，虹影对某些作者的劝诫近乎严厉：“不读书、不深挖历史，就不可能真正书写重庆。”她以自身为例：移居海外后回望故土，反而看清了这座城市从大轰炸到三线建设，从饥荒年代到影视重镇的历史断层。“重庆人有多重人格，这是创作者的富矿。”她特别提到南岸网红书店：“游客各看各的——有人看来福士，有人看索道。作家要写出这种视角的厮杀。”

虹影透露了自己犀利的“三刀流”选书法：首尾各五页加随机一页，语言张力立判高下。她重读20余位作家，名单宛如世界文学谱系——桑塔格、昆德拉、茨维塔耶娃、马尔克斯……这种挑剔源于她的创作信条：“作品必须扎根土壤，本土或异国皆然。60年代作家骨子里的坚韧，让他们的文字在任何土地都能生根。”

采访接近尾声，虹影预告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推出诗集与散文集，并着手创作新的重庆题材长篇小说。当被问及是否想挣脱“地域作家”标签时，她笑言早已用《罗马》等异国叙事证明边界可破，但重庆始终是灵魂的锚地：“江水已流进我的血管，只要写它，从不会有写作障碍。”此刻的虹影，正如同她笔下那座“永不衰老的女人城”——在网红重庆的喧嚣浮光中，执拗地以文学为缆绳，打捞着城市最幽深的历史记忆与人性矿藏。当游客在洪崖洞的灯火中按下快门时，她依然在字句间修筑着通向重庆精神内核的密道。

魔幻山城里的文学力量：四十年蜕变与新生代崛起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孟丽媛

张 者 本名张波，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出版长篇小说“大学三部曲”（《桃李》《桃花》《桃夭》），长篇小说《零炮楼》《老风口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朝着鲜花去》《或者张者》《山前该有一棵树》，散文集《文化自白书》等。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，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。

从1984年初抵重庆时“破破烂烂的大乡村”，到如今令导航失灵、电梯错乱的“8D魔幻之都”，重庆的城市蜕变，在张者的眼中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立体史诗。四十年岁月流转，他亲历了这座城市从“脏脏的稀泥塘水”到“山水相间中疯狂生长”的震撼历程，也见证着重庆文学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与蓄力。

城市蜕变：从“大乡村”到“魔幻之城”

“1984年的重庆，说实话，就是一个大乡村，破破烂烂，还比较脏。”忆及当年从新疆一路穿越戈壁滩、翻过秦岭初抵重庆求学时的情景，张者记忆犹新。火车旅途漫长，窗外是无垠的荒凉，一过秦岭，“绿水青山”扑面而来，这种震撼至今难忘。那时的重庆尚未成为直辖市，城市面貌老旧，唯有他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（现西南大学）如世外桃源，“翠竹青青，错落有致”，与北方平坦城市截然不同的立体园林之美，成为他对山城最初的深刻印象。

四十年风云激荡，重庆在他眼中已然“脱胎换骨”。山峦起伏、两江环抱成为其魔幻气质的天然画布。张者生动描绘了“魔幻”的日常：在一楼想去八楼，电梯会向下运行，因为“真正的八楼是在山坡下面”；导航在平路尽头戛然而止，拾级而下却豁然开朗，一片新天地跃然眼前。“楼群与楼群之间你是看不清楚的，必须走到马路尽头，一拐弯突然新的一片天地又出来了。”这种“依山而建，以水而临”造就的独特城市肌理，成就了重庆独一无二的视觉奇观与空间体验，使其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和影视取景天堂。

文学沃土：魔幻地貌下的深层挖掘

当被问及重庆的魔幻气质是否天然适配悬疑、荒诞类文学创作时，张者给出了更深的思考。他承认重庆地貌提供了绝佳的“镜头感”和层次感——北方平原城市难以企及。“在重庆，你面前的楼挡不住后面的视线，后面的楼顺着山坡上去了，它还能被看到。”这为视觉艺术提供了富矿。然而，他鲜明地指出，文学的“荒诞”本质在于故事内核与人文精神的深度，而非单纯依赖城市外观。“它是一种故事的荒诞，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极致的荒诞，是一种人文的、气质的东西。”重庆文学的未来，不在于简单套用地貌标签，而在于穿透火锅、小面的烟火气表象，深挖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——如抗战时期“越炸越强”的坚韧不屈，如当下在时代洪流中“雄起”的勃勃生机。

攀登之路：培育新苗，翻越“红岩”高山

面对重庆作家群是否已然“崛起”的提问，张者的态度审慎而务实：“只能说崭露头角，远未真正崛起。”他坦言，《红岩》这座文学高峰至今仍是重庆的光荣与压力，“长江后浪”仍需奋力攀登。为此，重庆作协构建了一套系统性、接力式的青年作家培育机制。

重庆作协启动了首批“讴歌计划·特约作家”，常态化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和“名刊编辑与青年作家结对子”活动，给青年作家搭平台、促交流、助成长。在打造文学精品方面，作协持续推动“讴歌”“扶优”“友声”“培新”四大计划，同时抓好评奖和作品转化，鼓励大家围绕重大主题创作，多出有重庆味、时代感的好作品。张者特别提到，政府也设立了“重点扶持作品”专项资金，对有潜力的创作计划给予支持，帮助作家们解决后顾之忧。

这套组合拳成效初显。张者欣慰地列举了林檎、周宏翔、周睿智等名字，他们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等顶级刊物崭露头角。最新一期《收获》青年作家专号中，重庆青年作家占据前两位席位。接下来，作协还将联合《人民文学》推出重庆青年作家专辑，并筹备研讨会，促成“重庆作家群”的真正成形。

时代交响：网红流量与文学深流的辩证

面对“网红城市”标签是否冲击本土文学生长的疑问，张者展现出通达的见解。他认为，互联网传播如同“新闻先锋”，其快速广泛的特质与文学所需的沉淀思考本质不同，但绝非对立。“新闻开始的地方，才是文学准备的地方。”重庆的网红效应吸引了全球目光，推动了旅游经济，更刺激了影视产业在此取景的繁荣。“电影会促进文学的跟进”，当影像不断呈现这座魔幻之城时，也会反向激发文学寻找新的表达模式。他形象地比喻，重庆的网红气质与未来井喷的文学创作，如同长江与嘉陵江在朝天门汇合，“一旦相遇就滚滚而下，直接向天上去”，相互激荡，喷薄而出。关键在于，文学要能沉潜下去，穿透表象的热闹，挖掘城市的精神矿藏。

守护星光：给未来作家的箴言

访谈接近尾声，张者语重心长地强调了青年作家必须绷紧的弦——保护知识产权。他坚决反对在作品未正式发表前随意在自媒体、朋友圈传播，警惕被剽窃风险。他提醒自发创作剧本者务必进行版权登记，承接定制项目则必须签订权责清晰的合同。“剽窃成风，特别是有了DeepSeek（AI）以后”，他痛心于部分年轻写作者对此的漠然，呼吁大家珍惜羽毛，用扎实的创作赢得尊重，因为“泡沫性的东西迟早沉下底，好东西终会留下”。

从破败的“大乡村”到魔幻的网红都市，重庆完成了物理空间的惊人蜕变。而在嘉陵江畔，一位位文学守望者正悉心培育着新的火种。当张者站在家中窗前，凝视对岸重庆第一高楼“一点一点”拔地而起时，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建筑的成长，更是一个城市文学生命力的蓄势待发。重庆的精气神，终将在新一代作家穿透火锅烟雾与网红滤镜的笔触下，找到它震撼人心的文学回响，朝天门两江汇流的磅礴，终将化为纸页间奔涌的力量。

周宏翔：今天的重庆焕然一新，又保持着市井烟火气

■受访人：周宏翔（青年作家） □采访人：张中江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

周宏翔 1990年生于重庆，作品见于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期刊，已出版《当燃》《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曾获第五届巴蜀青年文学奖、当当影响力作家等。

重庆上一次举办全国书博会是2007年，作家周宏翔还在上高二。那时的重庆和现在“完全是两个世界”。18年间，周宏翔陆续写了十几部作品，但直到最近的《当燃》，才将故事背景设在了家乡重庆。生于此地，多年生活在北京、上海的他，既是一个老重庆人，又是“新外来者”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状态也很像作家书写当下，既身处其中，又要拉开一段距离回望。

□今年全国书博会是时隔18年再次在重庆举办。18年前的重庆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
■属于我记忆中的那部分重庆，和现在的重庆其实完全是两个世界了。当时朝天门还是码头，还没有成为现在这样地标性的打卡点。爬坡上坎之间是各种批发市场和餐食小店，解放碑还是很高，还没有被周围的高楼商场彻底包裹。当时的过江索道有两条，根本没什么人坐，有一条还被拆掉了。也没有“网红”这个概念。重庆也没有像样的地铁，不存在大家说的“要下到地心”的感觉。我们习惯了上上下下地行走，置身在立体感之中，并没觉得特别，好像一切都过于寻常，类似于“无论魏晋”的那种封闭感。但现在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城市了，不单单是说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识，而是它突然有一种焕然一新的生命力，但同时又一直保持着重庆最本色的市井烟火，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。

□在《当燃》之前为什么迟迟不肯写重庆？

■准确来说，更早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把重庆当作过写作对象。但早年的作品里，虽然没有表明这是关于重庆的故事，其实心里的画面和言辞间的沟渠建造，都有着重庆的影子。我是一个在上海和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重庆人，我时常会把城市间融合在一起，加上之前的作品一直都是写城市生活，就更想靠近我当下的生活环境，所以很少回头去看。直到三十岁那一年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感觉需要挖掘的东西就只能往回捯，一下反而找到了特别强的发力点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以前对家乡始终有些敬畏，担心写不好。

□家乡重庆对你来说，有怎样的文化意义？

■精神原乡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处确切的地方，可能它更像是你在创作时能找到自己凝气的一个场域，这个场域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也是不一样的。重庆对我来说，首先是它的城市地貌和生活风貌本身具有特殊性，又是我最为熟悉的地方，相当于是我意识上的“根”。但是纵观创作文本，对重庆的书写还是不够的。文学本身也是一种传承，是需要不同年代的笔者接续记录，才能将一个地方包罗万象的文化逐一凸显出来的。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写出属于我这个时代的那部分，至于它是不是我的精神原乡，我不敢说，但它一定是我创作时极能发挥的一部分，和我写作的重要来源之地。

□茶馆对川渝地区的市民生活来说，有怎样的公共生活层面的意义？

■非常重要。甚至可以说是重庆日常版图的一部分。小时候我爷爷退休后就开过茶馆，那是我五岁前后非常重要的记忆，我每天会在那个地方观察形形色色的人，大多数是附近工厂的工人，当然也有老年人，还有一些生意人。他们会把茶馆当作是日常消遣的重要场所，打牌，下棋，搓麻将，摆龙门阵（聊天），很多时候午餐晚餐都在茶馆解决。每天都是高朋满座，沸反盈天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茶馆对于普通重庆人来说，重要性远超商场和饭店。如果说重庆人的生活有三大块，一定是家、单位和茶馆。我是一个从小在牌桌上长大的人，能看到的更多是生活百态和大众面貌，这对我后来的创作也起了很大作用。

□对90后来说，可以称得上共同社会记忆的有哪些？

■我出生于1990年，刚好赶上了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。对我来讲，一闭眼就能想到的公共记忆，莫过于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（当然对于更多人来说是香港回归），还有1999年的澳门回归（全校学唱《七子之歌》）和抗洪（捐款），2001年的申奥成功和加入WTO，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，2009年的世博会。当时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，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公共记忆。还包括报刊亭，以及Call机、初代绿屏手机、港台流行乐，这些都是在我们90后一代提到就会立马有记忆的。我的小说一直试图将过去和现在作对比，也是因为我刚好出生在新旧交替的时刻。“千禧年之交”是一个非常90后的概念，我特别希望我的小说中能够反映出这些时代对照的部分。就像我在小说中，既写到了这次的新冠，也回溯了2003年的“非典”。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思考的，为什么2010年之后的这种公共记忆是相对较少的？有一部分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对现实的冲击，将大众对事件关注的阈值提高了，另一个就是信息越发达，信息的有效性越容易被冲淡，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□从作家角度来说，如何更好地理解女性、写好女性？

■每次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都必须讲，男性是无法完全理解女性的，男性只能通过观察和思考，狭隘地表达女性的处境。但是有一点，在写作的时候，我其实极少会特意强调说，我就是要写一个女性的故事，而是，我要写一个特别典型的故事，但恰好主角都是女性。在描写人这件事上，远比要写女性这件事上思考得更多。因此，一个男作家完全写好女性是很难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做那个理解女性的男性，尽可能设身处地思考女性于社会和生活中的位置，她们的困境与男性的差异，这些都是值得去写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有很厉害的作家是能做到的，美国的作家埃默·托尔斯就是一个我见过非常会写女性的男作家，他有一本《上流法则》，写得非常细致入微，对于女性心理的揣测绝对是高级的。我相信他也一定是站在这样的立场和心理去书写女性的。

□近期的写作计划及印象深刻的书有哪些？

■去年写了几个短篇小说，今年也陆续刊登在了杂志上。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写一本新的长篇，是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有关，年代可能会推到90年代前后，刚好写下“世纪之交”的那部分。在写这本长篇之前，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背调，重新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希望能在年底前完成吧。最近读过的书印象比较深的，燕妮·埃彭贝克的《客乡》，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长篇小说，结构和语言都很有意思，然后就是在读罗萨的《河的第三条岸》，以及马里亚斯的《如此苍白的心》。